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3.007

论《米与盐的年代》中的他者化中国形象建构

叶冬,邓婧雯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美国当代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罗宾森的长篇或然历史小说《米与盐的年代》呈现了后冷战时期西方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小说中折射出了西方学者在有关中国的知识领域、思维方式和话语机制等三个维度上固有的成见和刻板印象,其本质是欧美“东方主义”视野下对中国形象的描绘和建构。针对欧美学者对中国文化误读这一现象,应以理性而审慎的批判意识去辨析和解读西方价值观下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并建构起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互鉴的平等互动的交流模式。

关键词:《米与盐的年代》;中国形象;东方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3-0051-07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但小说——尤其是科幻小说却可以。这里所说的假设即“如果—那么”,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另类想象,是对人类既往历史的修订和重构。《米与盐的年代》(*The Years of Rice and Salt*, 2002)就是一部或然历史小说(alternate history novel),即编写“显然从未发生过,因此不能称之为事实,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随着受压制成分的回归)或许会实现”的历史小说^①。作者金·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ey Robinson, 1952—)是美国当代最受欢迎的科幻小说家之一,代表作除了著名的“火星三部曲”(《红火星》*Red Mars*, 1992;《绿火星》*Green Mars*, 1993;《蓝火星》*Blue Mars*, 1996)之外,还有《荒野海岸》(*The Wild Shore*, 1984)、《太平洋海岸》(*Pacific Edge*, 1990)、《改写历史》(*Remaking History*, 1991)等。其中“火星三部曲”中的《绿火星》和《蓝火星》分别获得1994年和1997年的雨果奖(Hugo Award)最佳长篇小说,《米与盐的年代》则于2003年荣获轨迹奖(Locus Award for Best Science Fiction Novel)。小说共分为十部分,时间线长达600余年(1420年至2088年),以中

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为“分岔点”展开推演,并将其影响设定为欧洲死亡人数达到99%,导致近代欧洲文明尚未兴起便被扼杀在摇篮中。中国代替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现了“新大陆”,并通过在美洲获取的丰富自然资源走上了殖民主义扩张的道路。科学和工业革命则分别在中东和印度展开,后续便是中国、印度、穆斯林等非西方文明的东方国家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国际格局。该作品一问世,便引发了读者的热烈反响以及西方知识界的广泛关注。罗宾森通过这部既是历史想象又是史诗叙事的作品,描绘了多元文化间交流与冲突、对抗与融合的相互关系,并将其拓展为全球性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

一 “中国”——“棱镜”折射的国家

按照罗宾森的说法,《米与盐的年代》构思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正值日本经济跻身全球第三、亚洲“四小龙”腾飞和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时,一个全新的东方世界正在刷新着西方社会对

收稿日期:2023-12-23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JD017)

作者简介:叶冬(1973—),女,浙江温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科幻文学研究。

^①Wessling, E. *Writing History as a Prophet: Postmodernist Innov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 13.

东方的传统认知。随后,在苏联解体、“9·11”事件和后冷战格局的多重历史背景影响下,他开始书写和构建一部欧洲“缺席”“离场”并完全由东方文明主宰下的“想象性”历史。有趣的是罗宾森设计的这场“思想实验”,其“材质”是西方的,如欧洲鼠疫、地理发现、科学革命、殖民主义、工业革命、奴隶贸易、核能技术、妇女解放、世界大战等,但历史实践的主体却“嫁接”至东方或者说是东方化了的。对此,他坦言:“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欧洲一直主导着世界历史,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历史就是如此;无所谓好坏,基本轮廓众所周知。要解开这些线索,确定什么是欧洲所特有的,什么更具有人类普遍性(只是因为欧洲人先行一步而表现出来),这是非常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但这正是我的书试图做的一部分。”^①而科幻小说这一文类为作者的“思想实验”提供了便宜的条件:在线性的时间轴上,科幻小说往往以当下为“原点”向两端进行无限延伸——即“建构未来的喻象”或是“重构历史的图景”。

为什么是中国呢?其实早在二战结束以后欧美便掀起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热潮,且一直持续至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和清王朝覆灭的缘由,20世纪下半叶国外学术界“西方冲击说”盛极一时,而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则提出了“中国中心观”^②,指出在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前,清政府内部已经存在经济衰落、官僚机构腐败、皇权削弱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他认为导致清政府衰败的真正原因在国家内部,而非外部因素。孔飞力强调中国史自身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受当时意识形态和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影响,他变相突出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封建制度自身的症结与缺陷,从而削弱和淡化了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这是目前西方知识界一贯持有的学术立场。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中国经济和国家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威胁论”又甚嚣尘上,西方学术

界和政界始终不愿接受一个在文化、历史和宗教等各方面异于西方的强大中国出现在他们面前。无论是孔飞力的“中国中心观”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还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说”,都在或明或暗地为“西方优越、东方劣势”的观念进行辩护。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出版《东方主义》一书,揭示了西方知识界针对东方社会和文化存在的强烈偏见,并予以剖析和批判。他指出,“东方主义”理论框架的基本特征是“文本主义”“思维模式”和“话语机制”。“东方主义”首先是一个知识领域,它可以被称为“东方学”,具体含义为“任何教授、书写或研究东方的人……均为东方学家,而他或她所做的事情便是东方学”^③。也就是说,这些书写、研究东方的作者或学者所研究的东方,并非现实中的东方,而是文本中的东方^④。萨义德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他的观点为封闭而又刻板化的欧美东方文化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并启发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的确,罗宾森的《米与盐的年代》对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叙述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有中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在其描绘的“卷轴”下“显现出既先进又野蛮的矛盾形象”^⑤。尽管罗宾森除了2016年受邀来中国参加民间学术活动之外,并未有其他访华经历,所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上是前人相互援引的文本资料和相关译著,但他一直坚称自己对中国的友善和敬仰的好感。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言:“我想这本书中最有趣的研究和写作部分是中国部分,因为之前我对中国知之甚少,而中国又是那么的迷人。”^⑥罗宾森的这句话是颇有意涵的,一方面他道出了西方知识界对中国及东方世界的好奇与猜想(所谓“有趣”和“迷人”);另一方面,他们又确实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以及对东方文化基于平等和客观心态下的解读和探究。因此,

① Grant, Gavin J. “Kim Stanley Robinson Interview”,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iebound.org/author-inter-views/robinsonkimstanley>.

② 孙祥云:《华服上爬满了虱子——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华文文学评论》2017年第50辑。

③ Said, Edward Wadie.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 2.

④ 高曦:《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⑤ 张莉:《〈米与盐的年代〉中的中国形象与共同体想象》,《山东外语教学》2022年第3期。

⑥ Grant, Gavin J. “Kim Stanley Robinson Interview”,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iebound.org/author-inter-views/robinsonkimstanley>.

可以说罗宾森在作品中对中国的书写与表达极其符合一个典型的欧美东方学家的形象。

在《米与盐的年代》中,罗宾森对中国外在形象的刻画非常详细且具体。第一,作者不惜笔墨且不厌其烦地用夸张、奢华的表述和罗列的手法描述了中国富庶和霸气的景象。在第一部“觉悟虚空”中,跟随第一位主角的脚步,我们看到了中国船舶业、制造业和军事力量的繁荣景象:“迎面碰上一个巨型船队,船大得布尔德(Blod)想都没想到,每条船都像个城镇似的……中国人在这里。”“船队就像一个群岛。”^①这些舰船被描绘得十分壮观,宏伟阔气。对物质资源和商品品类的书写更为详尽,如:“大米、咖啡、鱼干、鱿鱼干、彩色棉布一匹又一匹……珍珠、粗铜、玛瑙、水银……铁锭、金币、银元……白瓷器。”该书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国力强盛的世界霸主,外在形象的描写十分宏大,各种细节的描摹也达到了极致,如“(船)外侧画着彩画,镀着金,镶嵌着珠宝和陶瓷图案”等。第二,作品的第一部分在描绘船只时多次用到“大”这一类形容词:“中国人!布尔德还不知道他们有这样一支巨大的船队。但事实就是这样。……他们就喜欢建造大的东西。”尤其在对郑和专用船的表述时极为明显:“五百人……这么多人在一条船上,真是不可思议,不愧是中国的船。中国人自己并没有认为船上拥挤,因为拥挤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事,这跟中国其他城镇里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两样。”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古代中国的想象和描写,既打造了一个繁盛的庞然大物形象,又逃脱不了表象化和刻板化的烘托,展现出一种掺杂着既令人神往又心生畏惧并暗含鄙夷的矛盾心态。

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罗宾森,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之一是“跟着故事的趋势……探索对中国和佛教的兴趣”^②。虽然作品中嵌入的中国历史事件展示了他丰富的知识底蕴,但如果非要锱铢细究,由于缺乏实地考察和更翔实的资料考证,他只能借助已有文本资料进行自认为合理的想象构

造。如在小说第一部和第六部中,有几处关于中国明清时期官袍的细节描写,刻画具体入微,却又失实。第一部可玉(Kyu)和布尔德碰见正在缉拿纵火犯的官员:“衙门来的人当中有一个大官,身穿长袍、胸前绣着一对白鹤。”此处问题在于:明代官袍胸前补子绣有白鹤是为正一品^③,而正一品官员亲自坐镇城门口捉拿嫌犯是不符合正常逻辑和基本史实的。而在第六部中,作者对公堂上的几个官员描述道:“有几个人的官袍袖子上绣着花纹,胸前装饰着四方图案,绣着熊、鹿或鹰,这表明他们是更高级别的官员。”据官方的《明史》记载,明朝无论文官武官,一至九品都无“鹿”或“鹰”的补子,而有“熊”补子的是五品武官。由此可见,大多数西方的学者在研究和描述东方及中国时,主要通过援引权威文本,借助前人的视角、观念和理论进行辨析,而非基于实证研究认知东方^④。

因此,依据西方学者所著的关于中国的文本或作者思维臆想中的中国形象来创作,错误便会代替事实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现实,故而破除这一刻板印象支配下的逻辑“怪圈”应成为西方学者在研究东方时必备的观念自觉。如一味透过既有文本研究中国,结果就是将这一套思维模式或明或暗地显现在其作品中。而以罗宾森为代表的一众后来学者,会沿着这一有失偏颇且又隐性的视角继续推究研习,加上本身所预设的先定观念和思维成见,这一模式便演化成了“一套相互征引、自我强化的系统……东方学就像一组棱镜,通过筛选和扭曲,重构出虚拟的‘东方’”^⑤。

二 “他者”——西方“异己”的东方

基于西方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近代以来西方知识界预设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对异质文化的价值判断的前提和标准,人为地曲解、选择、想象、评判和塑造其他不同于西方异质文化的“特性”,并在理性、文明与进步的自傲心态下,固化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

①金·斯坦利·罗宾森:《米与盐的年代》,李玉良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②Szeman, Imre and Maria Whiteman. “Future Politics: An Interview of Kim Stanley Robins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04, 31(2): 177-188.

③张廷玉:《明史(志第四十三 舆服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38页。

④高曦:《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⑤高曦:《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①“东方主义”所塑造的“他者”形象,是一个与自身文化相对立的价值形象和文化影像,即西方文化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并达到自我认同,会塑造一个“他者”形象,这一过程实际是以西方为标准,筛选出东方与其相异之处,并以这些差异作为建构“东方”的基本要素。简单来说,是由西方建构的“东方”社会价值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所以在“东方主义”观照下的“东方”并非真正的东方所拥有的特性,而是相比之下西方所需要的二元对立中反向的特性。在《米与盐的年代》中,有关中国人看病吃药和中医药材有着这样的描写:“在中国,有些人一旦觉得自己病了,就会有病乱投医,试着吃各种药,老虎全身各个部分几乎都能当药来吃。”虽然虎骨虎血和虎鞭入药是中医的事实,但也并不是“老虎全身各个部分都能当药吃”;此外,所谓“有病乱投医”“吃各种药”等,就是对中医和中国人的偏见和鄙视了。在该小说中,以这种思维模式、先定观念和价值尺度来评判中国现象及事物的话语,可以说比比皆是——其实这些本不是东方的特性,只是以西方为对照标准,人为塑造的东方形象。

正如前文所言,罗宾森在《米与盐的年代》一书虽然设定了西方世界及其文明的“离场”,但西方自中世纪以来重大事件和历史结点却如一条隐匿的灰线如影随行,从未“缺席”。显然作者在这一“或然历史”的编排中,仍然以西方文明的历史演进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框架和合理“图景”,这是作者在这场推演中无法抛弃的基本立场和历史逻辑,也反映了多数西方学者在研究东方文化和文明时一种天然的自负心态。其次,即便作者“慷慨”地将东方人或东方文化作为这一“或然历史”的实践主体,但其表述和结果却充满着惊奇、戏谑和荒诞性。作者一方面说“(历史)没有一种‘正确’的选择是可能的,因为从同样的初始条件中可以产生许多可能的历史”^②,但同时又认为“所有这些事情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会让

我们去思考它们为什么会以真正的方式发生。跳过这一点就会跳过这个想法最有趣的含义。所以它必须是一部历史小说”^③。显然,在作者看来,即便由中国或东方来再造历史仍然是有条件的——西方必须成为东方不可逾越的历史模板。

西方文化中典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会先把“己方”和“他者”进行明确划分。小说开头便表明布尔德是蒙古人,虽然在古代明朝时蒙古并未完全归顺当时的中原王朝,但仍属远东的一部分,况且至清朝时,蒙古已被收入中国版图,与清帝国合为一体。在第一部中,作者将布尔德的一言一行刻画成一个完全不认识中国的东方人,明显的体现就是在称谓上的描写。如作者频繁地使用第三人称“他们”来指代中国,在描写布尔德看到中国船队时,书中写道:“布尔德还不知道他们有这样一支巨大的船队。但事实就是这样。他们有宝塔,有长城。”而接下来用“中国人”进行他指就达5次之多。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作者罗宾森将布尔德移花接木地带入了自己作为西方人的视角。文中多用“他们”和“中国人”这类第三人称来指代中国,与之相对的是使用第一人称称呼自己一方的“我们”。欧洲中心主义者善于以主体身份高傲地审视着作为“他者”的中国,在整个描述的过程中一直在强调“我们”“他们”之间分明的界限,在贬斥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来满足其自身的傲慢与自信^④。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主体与客体间存在着主动与被动的不协调性关系,主体会以自身的价值标准、知识积淀和思维方式对客体行使研判裁断的权力。而近代以来欧美知识界对东方文化和形象的建构就是通过不断地权力制造、再制造,并以此生成一套对其有利的知识体系来发挥作用,如通过文学作品来塑造那个“非己方”的形象,并宣称这就是它的本质。在这个重新塑造的过程中,许多民族的文化、语言、历史和经验都被无视或者被忽略了。历史是人造就的,“就像它能够被毁掉和重写一样;历史总有着各种各样的沉默与省略,总有着被强加的形塑和被容忍的扭曲。以此,‘我们的’西方、‘我们的’

①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②Grant, Gavin J. “Kim Stanley Robinson Interview”,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iebound.org/author-inter-views/robinsonkimstanley>.

③Grant, Gavin J. “Kim Stanley Robinson Interview”,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iebound.org/author-inter-views/robinsonkimstanley>.

④张喜华,央泉:《论〈鲁滨逊漂流记续集〉中的东方主义》,《求索》2008年第1期。

东方就成为我们拥有并听从我们指挥的属于‘我们的’东西”^①。布尔德这一角色便是作者手下的一个提线木偶,通过他将自己眼中的中国描绘出来,并潜意识地将布尔德归为“己类”,而将中国和中国的事物作为“异己”的对照物,其结果就是扩大了熟悉的事物(西方、欧洲、“我们”)与陌生的对象(东方、中国、“他们”)之间的差异。

在明确了双方的立场后,便可以开始对“他者”形象进行重塑。中国在《米与盐的年代》中不仅在军事、建筑、经济等方面成就有被重构扭曲的嫌疑,在饮食方面更具有“他者”的形象。饮食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合,不同地域、气候和环境中的“食”的特点反映了自然秉赋、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其饮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对某一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误读,那也就间接误读了这一民族的文化。在第一部中,主角布尔德跟随船队抵达杭州时正赶上元宵节,节日期间菜式花样丰富,因此他有机会吃到“雄獐肉、马鹿肉、兔肉、松鸡肉、鹤鹑肉……蛤蜊、杏子雁肉”。到了四月初八杭州城同业会祭拜会神时,一家饭店举办野味“大宴”,称为八大美味,包括“龙肝、凤髓、熊掌、猿唇、兔雏、鱼翅、烤鹰,还有马奶酒”,然而这些食物在布尔德眼里却变成了“乌七八糟”的东西,“什么八大美味,真不知道这里的人是怎么想的”。从罗宾森列出的中国美食可以看出他的描绘是十分丰富的,但对这一饮食习惯背后的文化却并未深究,对其评价也十分刻板且主观。作者通过布尔德说“他们吃到了除牛肉和牛奶之外的各种食物”,似乎在西方人眼中牛肉和牛奶才是正常的食物,而中国的食材和烹食方法都是十分怪异的。

出现这种对中国饮食不太友善的描写,归根结底,与东西方国家话语力量的强弱脱不开关系。萨义德借鉴了福柯“话语即权力”的理论与观点,在强调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东西方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决定了西方“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②。小说第一部分的背景设定在明朝,中国国力尚处于兴盛状态,但作者在正史影响下创作的该小说,已然得知东西方力

量盛衰的历史走向:中国在清末时期国力迅速衰竭,西方却通过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实力急速上升。19世纪中叶,工业化的英国开始对农业社会的中国发动“不对称”的鸦片战争,不仅在财富和资源上对中国进行疯狂掠夺,甚至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嘲讽和歪曲。因此,从现实的或物质的层面考量,东方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的出现与西方近代扩张过程中东西方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清政府后期国力的衰弱,助长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话语表述的恣意丑化——中国饮食文化中各类丰富的食材就是一个屡见不鲜的典型例证,也是对中国文化污名化的惯常手法。以此为对标,将中国刻画成野蛮、异己的“他者”形象,目的在于塑造一个和自身对立、异于自身的文化影像。这一“他者”形象的建构逻辑最终成为西方知识界在认识和解读东方时的惯性思维。

三 “形象”——“话语”支配的镜像

应该肯定的是,罗宾森虽然不是知名的汉学家,但在《米与盐的年代》中却也表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诚实探究和谨慎“想象”。“他特意使用了中国古代皇帝年号纪年法,重述了14世纪以来郑和下西洋、万历援朝抗倭、甘肃回乱、江南妖术大恐慌等历史事件。”^③但支配这些有关中国或东方文化的宗教知识、历史事件和史实的话语体系与表述方式却异化为西方的了。西方在早期基督教与东方伊斯兰教穆斯林世界的对抗过程中生成了对东方的印象,这种因视野狭隘而产生的“无知想象”可以被视为东方主义的萌芽时期。然而,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尽管西方深受科学与理性主义思想熏陶,却仍未跳出本体与认识论上的误区,对东方的认知反而异化为“渊博的无知”——“欧洲文明中心论”继续引导着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知道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④。晚清时期的中国便是这种功利性原则的适用对象之一,直至今日这种影响依旧存在。

①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页。

②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③张莉:《〈米与盐的年代〉中的中国形象与共同体想象》,《山东外语教学》2022年第3期。

④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昔日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被欧洲人转化成“文明与野蛮”的斗争,于是一个全新的、符合欧洲征服需要的、带有异己色彩的东方在欧洲话语霸权的庇护下逐渐被构建出来,并形成了一套具有先定性立场的主题与话语体系,而不在场的东方只能沦为失语的“他者”。因此,浸淫于西方知识界中的所谓东方主义,所关注和呈现的是以西方为主体的、带有目的性的东方想象。《米与盐的年代》中,充满偏见和成见的话语频频出现,如:“中国也许一直都是中心,也一直都是人口最多的地区。”“因为世界最终以中国为本,能明白吗?我们(中国)的人口比世界其他国家人口的总和还多。”“他们(中国人)只关心中国,觉得中国正是天与地的终端,地球的中心,哪会相信什么天道?他们只关注中国,关注皇冠和龙殿(皇帝的居所)。大多数人认为世界的其他地方住的都是蛮子刁民。”这种话语无非证明了作者是基于一整套有关中国刻板印象的文本,在缺乏足够探究与考察的前提下,以西方固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对中国文化及现象进行的所谓“权威的”描述、评判与裁断。将东方定义为类似“由一群无差别的奴隶为神一般的暴君进行服务的国度”^①的臆断,在西方的知识界是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并笃信的。

中国在《米与盐的年代》中虽然被设定为拥有绝对实力的超级大国,但其内在形象,包括风俗习惯、饮食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都有其固有的刻板印象。例如第六部中,作者讲到康寡妇的长子辛(Shih)被人剪去了辫子,便慌得六神无主、嚎啕大哭,在勾描出一个迂腐软弱的中国学子形象的同时,也加深了西方社会对中国“辫子文化”的印象;第一部的可玉在运输船上惨遭阉割,作者透过可玉发出中国会把世界上“所有的男孩都阉割了”这一言论,映射中国的太监文化,还有康寡妇的裹脚陋俗所透射出程朱理学对人性的压迫,以及怪异杂乱的饮食文化等等。可见,西方以其现代性文化所设定的中国形象,是人为建构的“他者”,其作用是为了确立中国在西方观念中守

旧、衰败和畸形的形象,以此确证西方自身所拥有的科学和文明的现代性价值。于是,西方开始在东方主义语境下肆意勾勒中国形象: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中国是文明秩序的他者——野蛮的帝国。野蛮、专制、停滞的中国“他者”正好映衬了文明、自由、进步的现代西方。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不断制造规范的、相互对应的对立,就把‘他者’转变成了‘我们的他者’,也就是说,转变成我们自己(或对自己的某种理解)的反面肖像。在这一转变中,本来是未知事物的魅力,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扭曲形式的自恋。”^②作者通过这种固化于欧美知识界的思维方式,以及相互征引的文本书写和话语机制,成功形成了“西优东劣”这一主题观念。

这种以东方主义作为权力的话语工具,将中国塑造成落后、愚昧的形象,甚至加以丑化、“妖魔化”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部分西方媒体认知、刻画、写作、报道中国的话语基础,并对中国的知识界形成了一定的扩张力和影响力。中国的他者形象不仅代表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也为西方曾在中国所进行的殖民掠夺和扩张提供了最佳辩护,为其确立了所谓“合理性”。事实上,在西方文学思想的话语体系中,“只有那些符合欧洲/西方价值评判,迎合西方观点、偏见或符合非西方社会刻板印象的作品才能得到关注”^③,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都为其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意识所裹挟和驱使,制造出某些领地和人民需要或要求被统治,以及需要与统治相关的知识形式,比如“劣等”“臣属种族”“臣民”“依赖”“扩张”“权威”等诸如此类的字词与概念^④。《米与盐的年代》中描述的中国虽然代替西方走上了超级大国和殖民扩张的发展道路,但其反映出的内在形象受到了已然成型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与操控。而从现实的视角来看,也同样如此——尽管当今强大的中国让西方感到震惊,但“中国威

①Kalmar, Ivan. *Early Orientalism: Imagined Islam and the Notion of Sublime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30-31.

②Haun Saussy. *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 112.

③西奥·德汉:《比较“西方”和“其他地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肖美玲译,《外国语言与文化》2023年第3期。

④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胁论”的抛出证明了西方仍然拒斥一个崛起的古老大国和东方文明,从本质上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集权专制、观念陈旧和具有侵略性与扩张性的“异己”国家。如作者罗宾森在该书中借人物之口反复提到如下观点:“(中国)先乘船到达一个国家,然后跟它开展贸易,再在那里扶植一个愿意同他们合作的当政者。”“现在它(中国)控制着新大陆的西海岸,乐滋滋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金灿灿的金子滚滚而来,从而通过商品贸易汇聚了大量财富。”“很明显中国正在冉冉升起,成为当下世界的统治力量。”“这些中国人将要征服整个世界。”这样一来,观念成功地修改了现实,现实又进一步被意识形态所操控。

结语

《米与盐的年代》借助或然历史小说的形式展现了一部以中国为中心所构建的“全新”的世界近现代史。这部巨著可以看成是一次颇具想象意味的思想“实验”,它折射出了西方学者视野中东方文化与中国形象的新式图景。同时,从小说的结局来看,作者并没有给出比西方经历的近现代史实“更好”,或让人感到更为接近人类共同理想的结果,反而在“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以及“话语机制”等方面展现出了对中国与东方文化固有的刻板印象和本能的贬斥。这说明从当下国

际关系的格局以及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来考量,欧美知识界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进程,但在东方主义学术观和价值观的支配下,西方社会对东方和中国文化仍充满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偏见——尽管这不一定是作者的本意,但在其作品的书写中仍无意识地予以了呈现。从这一视角来看,小说与其说是重构了人类的“历史图景”,还不如说是基于西方价值观之上的人类“未来喻象”。对此,中国学术界一方面对欧美知识界中基于中国刻板印象所生成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要勇于进行批判和修正,尤其要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予以反思、揭示和矫正;另一方面,面对不同文明间的偏见、矛盾、对抗和冲突,要恪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话精神,倡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对于个体的知识分子而言,萨义德曾呼吁西方知识界应该警惕各种总体化、系统化的宏大理论,反对任何诸如“东方”和“西方”这样简单二元对立的本质化概念,重视具体的、现实的、边缘的人类实践活动,理性运用个体智慧进行批判思考并揭露客观事实——这一告诫对于东方和西方的知识界及学者仍有着极为深刻的教益。

On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ized Image of China in *The Age of Rice and Salt*

YE Dong & DENG Jingwe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contemporary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writer Kim Stanley Robinson's alternative history novel *The Age of Rice and Salt* as an object to explore the image of China constructed by the West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It analyzes the western conceptual stereotype of China's intellectual sphere, way of thinking, and discourse as reflected in the novel, which is essentially a portrayal of China under the vision of "Orientalism". In response to the phenomenon of mis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e should take a rational and critical mindset on the China-related work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values, and establish a model of equal exchange with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The Age of Rice and Salt*; the image of China; Orientalism

(责任校对 葛丽萍)